

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多钟,等候在湖南路中央党部门口的孙凤鸣终于手持记者入场证进入了会场。这里正在进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会场里到处是工作人员和采访的记者,场面有点混乱。几十分钟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汪精卫被孙凤鸣枪击事件。虽然此次“刺汪”世人皆知,但是,孙凤鸣是如何拿到会议的入场证,相关涉案人员又是如何被处理的,这其中的细节却鲜为人知。《发现》周刊辗转找到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总务处事务助理吴璜的儿子常少强,根据他保存的父亲吴璜留下的文字,才揭开了那段历史的面纱……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孙凤鸣“刺汪”谁险成替罪羊

■周希龄帮晨光通讯社索要入场证不得为何找吴璜
■因“刺汪”事件,吴璜将会受到怎样的牵连

吴璜说情,晨光通讯社最后时刻取得入场证

——叶楚伦严格限制记者入场证的发放——

1935年10月31日上午,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总务处文书科的周希龄出现在中央党部事务助理吴璜的面前。周希龄是来找吴璜帮忙的,他想帮晨光通讯社弄一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记者入场证。但是,这张入场证太难办了。

以往国民政府的各种会议,对记者的采访都比较宽松。但这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伦为防人多事乱出现意外,特别交代专管民政的彭格陈对记者入场证制定严格的标准。而晨光通讯社却不符合标准。

晨光通讯社于1934年11月成立,时间不到一年,这期间社址又迁移过两次,在南京不属于“刚需”媒体,不具备安排记者采访大会的条件。晨光通讯社的社长胡云卿十分焦急,几次派晨光通讯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去找彭格陈交涉,但都被彭严词拒绝。于是,贺坡光找到了周希龄,谁料,彭格陈不买周希龄的账。迫于无奈,周希龄找到了吴璜。他之所以在最

后的关头想到吴璜,那是因为他吴璜虽然不过是中央党部的一个事务助理,但却“有来头”。

我父亲是国民党老党员,是由两位中央大员、元老级的高级将领所介绍的。一位是国民党元老李宗黄,他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国民党改组后,曾任广东国防司令。另一位是潘宜之,曾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关于父亲吴璜的过去,58岁的常少强相当熟悉。他告诉记者,1935年时吴璜到中央党部上班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对各个部门的人都比较熟,再加上他的“来头”,一般人都会买他的账。果然,11月1日上午,见吴璜来说情,彭格陈没再坚持,当即给晨光通讯社办了一张记者入场证,编号63。此时,已经是上午八点多,距离大会开幕式仅有几十分钟。

这其中,除了晨光通讯社的胡云卿和贺坡光,谁都不知道,这张编号为63的记者入场证究竟意味着什么。

刺汪未成,记者孙凤鸣身中数枪血溅当场

——孙凤鸣一年前曾试图刺杀蒋介石未果——

实际上,晨光通讯社就是一个“暗杀组织”。其核心成员包括社长胡云卿、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的目标就是刺蒋抗日。晨光通讯社就是他们在南京的最好隐蔽之所。胡云卿,就是大名鼎鼎的民国“百变刺客”华克之的化名。通讯社的记者们每天向南京有关报社发稿,丝毫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怀疑。而实际上,通讯社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蒋介石的行踪,早在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记者孙凤鸣就曾经进入了中央党部会场,但是,由于蒋介石出现的时间很短,他未能顺利刺蒋。而在这之后,蒋介石出行,戒备森严,通讯社根本无从下手。到了1935年的10月底,晨光通讯社向各处筹措来的活动资金仅剩一百来块,难以以为继。于是他们决定一定要在四届六中全会上有所作为。执行这次任务的,仍是孙凤鸣。

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多,拿到出入证的孙凤鸣进入到湖南路的中央党部内。会场内人山人海,场面有点混乱,孙凤鸣来到厕所,将事先藏在掏空内件的照相机里的一柄三号小左轮手枪组装好,放入衣服口袋里。开幕式结束后,代表们排排站好,准备拍照,孙凤鸣发现蒋介石并未来到合影现场,便临时将枪口对准了亲日派汪精卫连发三枪,枪枪命中。但他随即就被国民党元老张继从后面抱住,张学良从正面踢向他的腹部,汪精卫的副官也拔枪向他连连射击,孙凤鸣血溅当场。

随即,警卫人员从孙凤鸣的身上搜出了那张辗转得来的记者入场证。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厅的负责人,驱车前往晨光通讯社社址陆家巷23号搜查。

宪兵司令谷正伦亲自部署,带领宪警撤下天罗地网,进行搜捕,那一夜的南京,鸡犬不宁。而涉案的相关人员,危在旦夕。

宪警布天罗地网,涉案人员多数被抓

——欲帮吴璜“脱嫌”,华克之留信但无用——

宪警们赶到晨光通讯社时,那里已人去楼空。陆家巷23号是前后两院,通讯社在后院。宪警们查遍全社,只查出办公桌上有留函一件,函面写“留交来人们”五字,信笺上写:“本社之事与郭智谋、吴璜、周希龄无关系,特此声明。”

同时,南京全城宣布戒严,交通完全断绝,在码头及机场将乘客逮捕了数十人,一律关押在清凉山的几间屋子里,但是没有查到一个晨光通讯社的记者。

此时,晨光通讯社的记者们都离开了南京,华克之辗转去了香港。但刺汪前就被接到香港去的孙凤鸣妻子崔正瑶却主动提出要回上海,携带一些钱救济刺汪事件的逃亡者。11月15日,崔正瑶被华克之的妻子和晨光通讯社

的工作人员谷子丰接到上海新亚酒店住宿。当天下午2点,谷子丰被捕,经不住严刑拷打,他把所知道的全部供出。崔正瑶被捕。而早在11月5日,避居老家丹阳的贺坡光就被捕归案。

受此牵连,经常到晨光通讯社走动的、浙江武备学堂出身的项仲霖,和在南京、镇江地区从事旅社业务的卢庆麒,以及曾经做过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调查委员的权允、晨光通讯社登记的户主刘书容,还有毫无关系的上海耀东医院院长傅耀东,和华克之家乡来的几个故旧,都身遭入狱之苦。

而事发当天,帮助孙凤鸣取得记者入场证的一系列人等全部被捕,包括周希龄、吴璜、彭格陈。华克之留下的信件,并没能帮他们洗清嫌疑。



常少强(右上图)根据父亲留下的文字,还原了吴璜(图片由常少强提供)帮孙凤鸣(张冰洁绘)取得记者入场证,以及吴璜被捕入狱及获释的过程
制图 张冰洁 摄影 快报记者 施向辉

经斡旋吴璜无罪释放恢复原职,陈璧君大闹一场要求将其枪毙

——各大报刊曾暗指吴璜是“刺汪”的幕后真凶——

我父亲被捕后,被上了手铐、脚镣,然后和周希龄等人一起被藏在一辆汽车里,押到深山旷野中的一个秘密军事机关,“常少强根据父亲的讲述回忆说,那个地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戒森严。押到那里之后,就将他们分别囚禁,隔离审问。”

审问吴璜的,就是宪兵司令谷正伦和警察署长吴思豫二人。他们对吴璜动了大刑。据吴璜事后回忆,当时他遭受了四种大刑,第一种是压双杠子,就是用木棍压腿;第二种是上老虎凳,压了好几块砖头直到膝关节脱臼人晕厥过去;第三种就是用煤油、辣椒水从人的鼻腔里灌入;第四种,用一根细麻绳,一头拴在人手的大拇指上,一头拴在人脚的大拇指上,将人倒挂在半空中逼取口供。我父亲那是伤痕累累啊。他想自己肯定是凶多吉少了,于是,他对谷正

伦破口大骂,把谷正伦骂得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其他被捕人员也相继被押送到同一个地方。一到夜深人静人最疲乏之时,审讯就开始了。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但几乎所有被捕者都视死如归。

刺汪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各大报纸都登载了吴璜被捕的消息。矛头直指吴璜,认为他就是刺汪事件的幕后指挥者。消息同时也传到了熊希龄、周震麟、程潜等人的耳中,他们亦开始设法营救吴璜。熊希龄是我父亲的恩师,此人很有来头,1913年,他就担任了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周震麟是我父亲在大学的老师,亦是中国同盟会会员,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而程潜是我父亲的老相识。”

很快,吴璜被押到江宁监狱囚禁,由军统派人看守。囚禁期间倒没有受到什么折磨。大概刺杀

汪精卫也是挺合蒋介石心意的,毕竟,汪精卫那时已经是蒋的“政敌”了嘛。”或许是熊希龄等人的斡旋起了作用,没多久,就有人到江宁来看望吴璜,他们带来了好消息:吴璜很快被释放出狱。果然,没多久,江苏高等法院宣布吴璜无罪释放。吴璜恢复了原职,仍回到了中央党部工作,周希龄也被释放,但没有恢复原职。据说,释放我父亲的时候,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还大闹了一场,她坚决要求枪毙我父亲,后来被挡回去了。”

而贺坡光等人,据吴璜回忆,被押到贵阳,后来与杨虎城囚禁在一处,汪精卫公开叛变投敌后,社会上许多正义人士保他们出狱,但未得到当局的准许。

至于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被捕之后,在一个夜晚,刚烈的她自缢于牢房内的窗户下,追随孙凤鸣而去。